

第一章 厦门客家古村落的探索研究历程

对于厦门客家古村落的研究,只是近十几年内的事情。探索厦门客家古村落的主要动因有两个,一是厦门政协的重视,二是客家村村民自身的努力。

南山村陈姓村民从小就被长辈告知“我们是客家人”。但究竟什么是客家人却一直不清楚。1997年,南山村陈美煌等前往南靖寻根问祖,这才从南靖沥水乡的宗亲那里弄清自己是客家人的来历。1998年,厦门市政协有识之士意识到客家文化对厦门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重视客家文化。研究一种文化,自然首先要了解其载体。客家文化的载体当然是客家人群,从历史的传承的角度要求,还必须从研究客家古村落着手。按这个思路,便有了探寻厦门客家村的动议。这一动议对同安区政协很的鼓舞,因为同安是厦门市历史最悠久的,客家古村落在同安的可能性最大。于是,同安区政协委员、同安一中历史教师陈金城先生及政协干部在得知同安莲花镇后铺村的老屋是客家建筑,就立即前往考察。但这次考察的结果是:该古建筑是属客家建筑形式,但村民并不是客家人。其后,南山村村民、同安陈太傅祠秘书长陈荣林先生得知此事,向区政协报告南山村是客家村的事实。至此,对厦门客家古村落的调查和研究可谓正式发端。

在探寻客家村的最初阶段,陈荣林和陈金城功不可没。陈金城多次深入莲花镇蔗内村(南山村)客家村,并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著文宣传,呼吁保护客家文物、提议开发有客家特色的旅游事业,为厦门客家研究做了大量工作。陈荣林先生在搜集文物资料和协助客家研究和宣传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石根平石根崇为作者讲述杨五郎庙的变迁

他们的这些活动引起了福建省及厦门市新闻记者们对厦门客家的浓厚兴趣，他们借助新闻传播的优势，报道了厦门客家村的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进一步推动了厦门客家古村落的研究工作。

就厦门客家的研究和“发现”过程看，应该说最早为人所知的当属同安区莲花镇的南山村。正是陈金城、陈荣林的努力，同安区政协的关注和宣传，引起有关新闻媒体的重视：

2001年4月21日，《海峡导报》第四版发表该报记者张雅叶的文章《厦门有个“客家村”》，首次报道了同安莲花镇南山客家村的情况。

2001年4月22日，《厦门晚报》记者蔡恺、陈贤武撰写的《同安发现“客家村”》，报道同安莲花镇蔗内村（南山村）客家宗族古建筑群，提出“建筑群应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产物，仿照客家南靖原籍宗祠建成，建筑群规模宏伟，至今保护完好，陈氏宗族至今保留某些独特的客家古习俗”，并提出“这是我市目前发现的唯一的‘客家村’”。

2001年12月20日，厦门市同安区的报纸发表了陈金城先生撰写的《同安客家村》。以散文的形式报道了南山客家村见闻，较全面地报道了南山村的特色和风光。

第一章 厦门客家古村落的探索研究历程/3

本人参与厦门客家研究也是基本在这一时期。1999年,本人从福州来到厦门,接受了厦门总商会编辑《厦门商会史》的任务。这项工作对于我了解厦门客家活动情况和进行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厦门商会史》的编辑过程中,本人发现了客家人各个时期在厦门活动的记载,接触了不少对厦门历史有较多了解的客家人士,同时也认识了不少对厦门历史十分了解的专家学者。



作者在南山村调查,图中发言者左为陈美煌,中为陈荣林

从所收集的资料和有关学者的研究线索表明,客家人很早就开始在厦门进行活动了,只是由于闽南人在厦门占绝对优势,客家人的活动未被重视。由此,本人萌发了一个念头:厦门可能有古老的客家村落存在。正好在这时,看到海峡导报和厦门晚报的报道,后来,通过与同安区政协联系,得知同安区南山村确为客家古村落,此外同安还有溪尾村(当时还属同安区,现属翔安区新店镇)及其他个别村庄可能也是客家村。通过同安区政协提供的线索,本人与陈荣林先生取得了联系。后来,通过莲花镇政府找到了莲花镇蔗内村支部书记陈水筑先生,并专门走访了南山村,对南山村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此后,又通过陈荣林先生的联系,拜访了溪尾村的客家乡亲,正式对厦

门客家古村落的调查和研究。



作者和厦门市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领导看望南山村客家乡亲

提供坂美村线索的是厦门总商会聘用的原武平县退休教师石梅龄,通过石梅龄先生,笔者找到了坂美村的石根平先生。石根平先生提供大量坂美客家石氏家族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和研究,证实这是厦门最早的开拓者之一——“西石”因罹祸避难而衍化成的客家群体,其最近支宗亲是武平中堡石氏、南靖石氏,及广东兴宁、连平等县的石姓人。这支石氏客家人,包括已移居台湾及国外的,约有二十万人。

2004年下半年,笔者与一批客籍人士一道着手筹备成立“厦门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为了使厦门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笔者与厦门客家经济文化促进会的部分发起人先后集体走访了坂美、南山和溪尾客家村,这一采访过程使厦门客家古村落研究进一步深入。

2007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在厦门召开。论坛期



在翔安区新店镇溪尾村调查

间,厦门市及海内外数十家媒体报道了有关活动的消息,特别是关于厦门客家村的报道在全市各界引起极大的关注。有不少读者向笔者反映了可能还有其他客家村的线索。其中老专家洪卜仁先生就对笔者建议去海沧寻找,他认为海沧应该存在我们还不了解的客家村落。不久,厦门日报一位记者又向笔者通报了海沧区东孚镇的鼎美村可能就是客家村的信息。

2008年初,通过海沧区商会秘书长庄旭初先生,笔者了解到鼎美村的初步情况,后来又有海沧区经贸局副局长沈全水先生提供了联系方式。4月28日,笔者前往海沧区东孚镇鼎美村采访,鼎美村胡氏宗祠负责人、74岁的胡世成老人介绍了该村从永定迁来的历史。至此,鼎美村的客家身份终于向外界完全敞开。

后来,笔者又考察了同安区和翔安区部分古村落,采集资料和研究工作还有待继续。根据本人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厦门的客家古村落可能还有好几个,分布于岛内外,随着客家研究工作的深入,厦门客家古村落的庐山真面目将更明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二章 厦门客家古村落概况

目前,经调查确认的客家古村落主要有同安区莲花镇的蔗内村(南山村)、翔安区新店镇的溪尾村、湖里区的坂美社、海沧区东孚镇的鼎美村等。现对这些村落介绍如下。

第一节 坂美社

坂美社,是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村的一个自然村,现有村民 300 多人,全为石姓。坂美社居民是厦门最早的开拓者——“西石”的后人,也是厦门岛内石姓族人唯一的聚居地。

众人皆知,厦门最早的开拓者:东黄、西石、南陈、北薛。但很少人知道,这四大旺族中的“西石”(准确地说,是现居岛内的石氏后人)是地地道道的客家人。

“西石”的发祥地在今杏林的高浦村,原名鹤浦。高埔地处厦门西海域北部突出的半岛上,是白鹤山脉向东南海中延伸的突出部,东南西三面紧抱鳌江,犹如白鹤立于水中,故得名鹤浦。这种特殊的地理形势,使之成为古代海防重地,是古同安城的西南屏障。

据坂美石氏族谱记载,石氏原为古寿州(今安徽寿县)人,始祖石螽 16 岁因平乱有功授福建部尉。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 887 年)移入鹤浦村。二世祖石琚于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 年)举进士,官终司勋员外郎,后葬于同安。其后石氏一族日益繁盛赫,至宋代成半县旺族。有宋一朝,同安 47 名进士中,石氏占了 8 人,即石仲甫、石



坂美大夫第供奉的“始祖唐赐进士司勋员外郎”牌位,牌位主人石琚系石鑫扈之子,应是厦门石氏第二代。石琚字居正号正庵,五代后唐天成四年进士,授司勋员外郎

遵、石赓、石仲攸、石豆、石倪、石邻、石宪、石起宗,其中,宋皇佑元年石遵、石赓父子同科,石选、石亘分别于仁宗嘉祐元年嘉祐八年进士及第,传为佳话。高宗绍兴三年(1154),朱熹任同安主簿,曾为石氏撰写《鹤浦石家祠堂记》,极赞石氏之荣。孝宗乾道五年(1169),石起宗为尚书,再创荣耀。光宗绍熙三年(1188),朱熹任漳州知州,为石氏宗庙撰写对联“宋室尚书府,银同甲第家”,描述石氏当时的显赫。

宋之后,石氏人丁兴旺,子孙移居各地,现知的有浙江、广东、闽西(武平)、台湾及东南亚等地。

厦门石氏融入客家,缘于偶然。明朝初年,因谣传闽南有“龙

脉”，将出“真龙天子”，朝廷派江夏侯周德兴巡查闽南，斩断“龙脉”，以绝后患，石氏因而深受其害，四散避祸。为逃避朝廷的追杀，石氏子孙躲进深山老林，大部分进入漳州、龙岩等客家人居住的山区，融入客家。明末清初，石氏部分子孙陆续返迁坂美社。



坂美村大夫第

现在的坂美，仍有显示尊荣的大夫第，森严的大门两侧还有两个小门。中门平时不开，只有这小门是平时出入的所在。这种规制是当时官位品级的直观表现。府内神桌上仍供奉“清三房长十世祖国学生讳耀端石公暨妣陈孺人神位、皇清诰封二品夫人元配慈惠夫

人黄氏神位”。该建筑清代建造,已在石氏返回坂美之后,与宋代“西石”鼎盛时期的建筑不可同日而语。大夫第的后人称,该大夫第建造人为石耀宗,他共有八兄弟,从其父石时龙起五代时为大官(这个说法似有炫耀之嫌,因为当时的同安县志上查不到坂美石氏有举人以上的人物。石时龙可能属于富户,通过捐官取得出身)。这支石氏后裔此后还播迁到台湾、新加坡各地,石时龙本人晚年曾在台湾经商,台南的安平里有一条街住民全部姓石,还有一座与大夫第构造一样的房子。

距大夫第不远处,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房屋,叫九九门第,整座房屋共有 99 个门,即有 99 个房间,其族之盛可想而知。不过目前这里的住户多移居海外了。据老人回忆,20 世纪 50 年代,坂美社只有 9 座老房子,全村 200 多人都住在其中,“九九门第因为房间多,最高峰时住了半个村子的 100 多人”。

九九门第的建造者是石月中,他从事远洋航运业,拥有来往于北京、天津、台湾等地及菲律宾等海外国家之间的商船 99 艘,但每次增加到 100 艘时就会发生沉船事故,他的船队规模从未超过 100 艘。九九门第的一个房间代表一艘商船,所以建到 99 间时不敢再建。99 这个数字,揭示了主人的良苦用心,而到了今天,其寓意也耐人寻味。据说,从坂美移居台湾和海外的有数万人,目前仍居在坂美的石氏族人只 300 多人。

“西石”对厦门早期的开发,功不可没。石氏因避难而融入客家,返回坂美后得到又一轮较大发展,他们和后来进入厦门的客家人一道,为厦门的社会经济进步继续贡献力量。

第二节 南山村

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习惯上叫南山村,现有陈姓(原余姓)村民

1200 多人。



南山村全景图

据余氏家谱载,由余,晋人,后入秦为大夫,为秦谋伐戎之策,得国十二,开地千里,致秦霸西戎。由余后人以其名为姓,即有余氏。余氏后徙新安成大族,再徙江苏,故以下邳、吴兴为郡望。

南山余氏开基祖余戴,字渊海,于唐代开基福建同安十五子山下新安乡。余戴生三子,其长子余从和次子余咸先后外迁。

唐僖宗乾符四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南下至福建,一支偏师在同安(当时叫大同场)与当地守军发生激战,余戴率幼子余哀避战乱出迁光泽。再入宁化。

长子余从,徙广东曲江县,其后裔有一支于明万历年间播迁斐济。1999年,斐济侨领余汉宏回国参加国庆观礼,特地到莲花南山村、新店溪尾村谒祖和会见宗亲。

次子余咸,迁居江西鄱阳县淮王坦村。

三子余哀,避黄巢之乱随父徙光泽县,再迁宁化炉口头牛栏岗。南宋隆兴年间,余九五郎迁徙至永定县金丰坝头社,以余九五郎为一世祖。余九五郎长房曾孙余得真又徙永定湖坑洋刀村。至传元中叶,其后裔余士康再移居南靖县靖城沥水乡(现名沥阳村)。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南靖余氏五世余子玉,讳德虔,从南靖迁回同安,先

是在坊里做生意,旋回到十五子山下归德里河田南山村(今莲花镇蔗内村)定居。为纪念居地南靖,特创堂号“漳南”,余子玉为南山一世祖。传五世余端钰、余端好兄弟,合建现存的南山余陈氏祠堂。



南山村客家村民

相传,余子玉从南靖到同安,寻找可生息发展之地,求助于神明,神明指点:“担子上一头挑神像,一头挑铁锅,往西边的深山走去,待锅沿磨断绳索,铁锅落地之处,便可定居下来,这个地方,是个绿水萦绕的山谷”。余子玉挑着神像和铁锅,走着走着,来到南山村,绑着铁锅的绳索断了,就此定居。这个传说显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却道出了客家人迁徙卜居的一般特点:讲风水,住山区,求安全,重物产。

朱熹主簿同安时,来过这里,盛赞这里“石牛潜谷底,永世不饿殍”,还说此地“大旱半收,大乱半忧”,是一处风水宝地。村民在朱熹驻足处建起一亭一殿格局的保德岩寺,奉祀陈姓祖佛普静祖师、玉皇太子、三太祖师、田圣王、郭圣王及妈祖。寺前一块巨石探溪,即为“石牛吸水”。

清末民初,南山村里发一种怪病,80%村民得“臭头”(痢痢头),村民觉得不吉利,有人提出另择栖所。于是又问卜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对曰:此乃大吉大利之地,绝不可轻弃。村人之得病,是因为水源断绝,石牛久未洗澡,身子太脏之故。于是村民在村后挖了一条大水圳,引水穿村,并在全村进行“卫生运动”,果然水到病除。此说自然也难避迷信之嫌,但整治环境,有利健康,不能不说是科学之举。



南山陈余氏家祠

万历初,余姓五世余端钰、余端好兄弟,合力建造三落大厝一座,双边护厝、后界巷厝各一列。南山客家村陈氏祖厝大厅有门联“源三晋望三吴皇唐新安主宗祀,拓闽北开闽南大明银邑展华堂”说明家族的迁徙史。

南山余氏长房端钰生六世余怀珍,娶妻南珩陈氏,因虑祖上人丁单薄,问卜改从妻姓,连生四子。男丁生前改陈姓,死后神主复姓



他们与自然心气相通

余,以志余氏根基,人谓“陈皮余骨”。二房余端好养鸭为生,后举家迁居新店赤山,开基溪尾村赤山堂余姓。而后,新店溪尾村赤山堂余氏后裔也有再返迁南并改姓陈者,称为“下房”。

南山余姓逐渐发达,除分衍到现翔安新店溪尾、澳头外,还有移居到金门烈屿昔果山等地的宗支。

余子玉的另一部分后裔居同安北门和后坂路林社(凤南农场),仍以余为姓。

《漳南陈氏族谱》载,南山余氏昭穆为“德维宗道,端怀尧钦,继为兴启,隆昌盛临。懿范敬式,祖训铭箴,诗礼有志,克绍徽音”。现南山陈氏仍用余氏的堂号和昭穆。

现在,厦门同安莲花镇南山客家村的陈姓村民 1200 余人,都能说出自己是唐代余子孙,是宋代永定、南靖客家余姓之后裔。虽经数百年之融合同化,但某些客家古俗至今保存,以明代祖厝为中心的客家宗族古居民建筑群保存完好。

第三节 溪尾村

翔安区新店镇溪尾村，现有余姓村民 2000 多人，是同安区莲花镇南山外迁的余氏分支。



溪尾村，距翔安隧道口 4 公里，南山、溪尾宗亲在隧道口合影

南山余氏传至五世，长房余端钰，二房余端好。端好以养鸭为生，长年赶鸭群至九溪觅食。鸭群顺流而下，至翔凤里十四都溪尾赤山上（今溪尾村），结草为庐，从此定居。余端好夫妇早逝，留下一女二男，女名余冬，长男余汝昭，二男余汝穆。余冬终身不嫁，含辛茹苦抚养两个幼弟成人。余姓后人尊她为“贞义姑”、“姑婆祖”，立匾额“贞孝”于祠堂，享春秋两祭。

余汝昭后裔定居溪尾，以余汝昭为溪尾开基祖，以赤山为堂号。祖祠楹联“派衍赤山后山前埔犹如天设屏案，堂开溪尾左溪右圳恰似



溪尾村余氏家庙

地造城池”。溪尾的昭穆是：建承源吉光正代安乐，永世鸿耀善德远其昌。现已衍到善字辈。

溪尾村余氏宗祠一座二进，建筑面积 240 平方米，前厅悬“贞孝”匾，后厅悬“进士”、“文魁”、“武魁”匾。余冬娘为溪尾村始祖余端好之女。据《马巷厅志》载：余端好夫妇英年早逝，二子尚幼，作为姐姐的冬娘立誓不嫁，含辛茹苦，抚养两弟成人，完成心愿后投环离世，官民感叹。“进士”匾题款为“崇祯进士任漳浦县令擢御史出巡山东进士余日新立”，“文魁”匾题款为“顺治文魁官至礼部尚书余一元立”，“武魁”匾题款为“仁宗武魁拜帅十年擢工部尚书余靖立”。《同安县志》不载三人之事，因其非同安本地及第，乃余戡外迁子孙。《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载：“余日新，明龙游人，字君又，崇祯进士，任漳浦县令，有治行，擢御史，巡抚山东，亲自守城御患，底定兵乱。上书荐刘宗周等，疏刻兵部尚书陈启新，后以太仆寺卿致仕。”对余一元的记载为：“清山海卫人，字占一，号潜沧，顺治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有《潜沧集》。”对余靖的记载：“宋曲江人，字安道，以文学称乡里。天圣初登



溪尾村神庙“吴府王爷宫”，建于清顺治年间，
为本村“当境佛”，“文革”毁，1976年重建

第，授左正言，以范仲淹谪官事，与欧阳修同被贬，与修、王素、蔡襄并称“四谏”。三使契丹。依智高叛，经略南事，为帅十年，不载海南一物，广州绅民建‘八贤堂’祀八位贤父母，靖其一也。官至工部尚书。卒谥襄，有《武溪集》。”此三人均为唐代余戡子孙，在讲究荣宗耀祖的古代，于祖地祖祠立匾炫耀，是情理中事。尤其是余日新任漳浦县令，漳浦与同安近在咫尺，回祖地谒祖立匾更为容易。但此三人的共祖是余戡，荣匾应悬于南山祖祠更为合理。而三人的荣匾却悬于溪尾祖祠。其原委现已无据可考。只有一种解释较有道理，即南山余氏后来改姓为陈，外迁的余氏子孙（他们仍为余姓）的荣匾挂在“陈余家庙”似为不妥，所以后人就把这三方荣匾移到溪尾余氏祖祠了。溪尾村历史上属同安，现属于翔安。与余日新、余一元、余靖的先祖余戡开基的十五子山下不远，也可算是他们的祖地，况且除此在同安境内没有别的余氏祖祠。这与外迁到斐济国的侨领余汉宏回同安谒祖时先找到溪尾余氏祖祠是同一道理。



余氏家庙的“文魁”“武魁”匾